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

王振锁 徐万胜◎著



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 杨栋梁——主编

世界出版

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 杨栋梁 / 主编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

王振锁 徐万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 / 王振锁, 徐万胜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11

(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

ISBN 978 - 7 - 5012 - 3695 - 4

I. ①日… II. ①王… ②徐… III. ①政治制度—历史—研究—日本—近代②政治制度—历史—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D7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6921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总 校 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刘 凌

书 名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
Ribei Jinxindai Zhengzhishi
作 者 王振锁 徐万胜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980 × 680 毫米 1/16 30 1/2 印张
字 数 51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3 月第一版 201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695 - 4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丛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
(04JJD770002) 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项目
《日本近现代史研究》(2001—2005) 的成果。
本丛书由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哲学社会
科学创新基地(“985 工程”二期项目) 资助出版。

总 序 日本现代化研究的视角与课题

一、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视角

如果从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好望角（1487 年）并到达印度（达·伽马，1498 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首次 1492 年）算起，人类跨入近代社会已经 500 余年，但中国和日本被拖入近代的历史还都不到两个世纪。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划分，“近代”（Modern times）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因此可以把“近代化”（The modernization）视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然而，当 1917 年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便翻开了“现代史”的第一页，这是以往的教科书普遍采用的标准历史分期法。

但是，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人们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今天，我们所有为现代化建设奋斗的人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和性质呢？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课题组的全体成员来说，这的确是个无法绕过的理论难题，因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客观世界里，社会主义转过头来“补课”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也在调整并继续发展，“市场经济”不再是区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20 世纪以来处于并行和对立状态的两大社会制度，正呈现交叉、互补、趋同发展的状态。

我们理解的现代（The present age），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与“当代”的含义基本相同的概念。而我们理解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起点、范畴、内容、性质等所有层面上既有大量与“近代化”重合的内容，又不受“资本主义化”思维范式的约束。现代化是一个近代以来人类摒弃封建生产方式和思想传统、追求更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会把资本主义的工业文

明、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不断推向顶峰，同时也在孕育和创造着非资本主义本质、引领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新因素。现代化既是“近代化”的延续，也是对近代化的发展和超越，而近代化=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仅属于现代化的前期阶段。

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可以认为，以资本主义的出现为起点的人类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曾形成过以英、法、荷为代表的原生范式，以德、俄、日为代表的继起范式，印度等众多殖民地国家的依存范式，苏联、中国等的跨越范式。相对于原生范式而言，后三种范式皆属于“赶超式”范畴。并且，在所有的四种范式的现代化进程中，皆不应排除产生非资本主义本质、引领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新因素的可能。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长期性、多样性、曲折性、整合性特征的历史过程，只有同时把握历史发展的横轴与纵轴，才能理清事物发展的全貌，掌握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和运行规律。在分析的方法上，则有必要从摸索与创新、碰撞与交融、试验与修正、互动与均衡的不同视角出发，开展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整体的而非个别的研究。

二、日本现代化研究的思路和课题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范例中，日本无疑是最值得研究的一个对象。这是因为，日本不但是近代亚洲唯一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当代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却在始自近代的现代化过程中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学习；日本是近代给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中国要与这个“搬不走的邻居”世代交往，就必须掌握其民族特性和社会运行机理，知己知彼，温故而知新，以便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妥善处理与日本等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日本不但是“后发型赶超”的代表，而且提供了陷入“赶超后困境”的实例，对于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迅跑的中国来说，扬长避短汲取日本“赶超期”和“赶超后”的经验及教训同等重要。

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在“整体研究”的大框架下，能否抓住重点并取得突破，关系到研究的价值乃至成败。

本课题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一条主线、二条发展道路、三次制度变革、四大分析视角、五大专题领域展开研究。

关于“一条主线”。最近，连日本政府也公开承认，迄今为止日本

实行的是一种“官主导经济社会体制”^①。的确，尽管程度不同，方式各异，国家权力干预在战前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抓住了这条主线，也就把握了日本的现代化非属自然生长而是“人为组织”的显著特点。

关于“两条发展道路”。明治初期，日本为走向近代，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三大口号，而其具体途径却很快变成了以“强兵”为前提的“富国”，日本亦因此成为五大列强之一。但是，日本选择的这条近代化道路有效也有限，并终因在二战中的失败而走到尽头。二战以后，日本先是被迫、随后自愿地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其现代化成果可圈可点。两条道路，不同结果，其经验和教训不仅属于日本，也属于人类。

关于“三次制度变革”。按照经典作家的诠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其产生、形态和性质原本由经济基础决定。但是，通过明治维新实现的社会变革，却突出地反映了上层建筑先行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效果，提示了“后发国家”近代化实践中“制度设计”的一个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出现，为了打破危机，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又开始了一场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改造国家”、“修正”资本主义的运动。然而，由于军部和官僚掌握了运动的主导权并左右了运动的方向，“昭和维新”的结果却是把日本社会推向了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极端，“纠错”变成了“反动”。随后进行的战后改革不仅清算了法西斯体制，而且对危机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制度性的再改造，由此建立的“战后型体制”为“昭和变革”画上了句号。“平成变革”是在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对赶超阶段颇为奏效的“战后型体制”的否定，这场变革虽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仍在继续。

关于“四大分析视角”。由于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对日本现代化起步、发展、深化、调整等不同阶段进行研究时，条件约束、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绩效评析四个层次的梯次分析是必要的。这四大要素不仅构成了每一时期或阶段现代化的内容，同时也会作为一种“遗产”，成为下一时期或阶段现代化的“约束条件”。日本的

^① 见安倍内阁2007年1月25日决议《日本经济的进路与战略——新的“创造与成长”路线》，日本内閣府网页URL〈<http://www.kantei.go.jp/jp/singi>〉。

现代化是在这种既联系又中断（改革引起的质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

关于“五大研究领域”。“现代化”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大至宏观，小至细微，皆应被纳入研究视野。如果做大的分类，则可划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和对外关系五大研究领域。普遍寓于个别之中，就日本这一特定研究对象而言，现代化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只有阐明现代化在不同领域的实践及其特点，才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个别到整体地把握日本现代化的总规律和总特点。而在各个专门研究领域中，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多如山积。例如，现代化路线选择、调整的决策机制和政治运行机理，民族凝聚、国民统合的依据、途径和方法，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及其发展模式，家庭、群体、社会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民族心性、文化偏好、审美意识、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的特异性，对外关系上的思维习惯及其采用的原则、策略和手段等，都是解析日本现代化之谜所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对此，我相信丛书各卷会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三、挑战与超越——本课题的缘起和组织

2000年3月，1988年成立的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由“虚体”变为与其他系所并列的“实体”（大学实行学院制后，又于2003年5月升格为现在的日本研究院），研究环境大为改观。其时，中心制定了历史、经济、政治三学科建设的发展战略，策划了若干中长期研究项目，其中包括“日本近现代专门史研究”课题。

拟定这一课题是出于以下考虑：随着我国日本研究的深入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必要推出大型、有持久影响力的学术精品；日本近现代专门史系列研究不仅在我国尚无先例，即使在日本迄今亦未见类似研究成果，因此这一研究有望取得学术突破并产生国际影响；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基础雄厚，如果与研究资源进行合理整合，有条件完成这一综合性研究课题；南开日研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重点单位，可以争取到启动课题的必要资助。

2001年7月，“日本近现代专门史研究”课题组成立并隆重举行课题启动大会，侯自新校长任课题组名誉负责人，校社会科学管理处领导赴会并讲话，数位国内知名日本研究专家受聘为课题组学术顾问。当时

计划以5年时间完成课题。

2004年,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入选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日本近现代专门史研究”为基础申报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作为基地首批重大课题获得批准。由此,两项目合并以后者命名。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为了统一写作思想、交流研究经验、解决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课题组先后于2002年4月在河北大学、2003年4月在本校、2004年7月在苏州、2005年在山西大学、2006年10月在天津蓟县、2007年6月在承德召开专题研讨会,课题组成员在丛书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学术性三原则上达成了共识。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及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玉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先生、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健教授等作为课题组学术顾问,多次出席研讨会并提出指导意见。回想起来,每次研讨会都是一次认识上的升华,讨论会的热烈气氛令人感怀。

本丛书坚持写作规范统一、学术观点自由原则,因此丛书各卷的观点和文字均由作者负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本课题启动后不觉历经8年。此间,课题组成员中告别讲坛的前辈有之,我辈青壮亦鬓发霜染。当此10卷约500万字丛书付梓之际,几分喜悦,几分惶恐,亦有几分惆怅。在此,向课题组所有成员和学术顾问道一声“各位辛苦了”!我们完成了这套丛书,也铸就了难能可贵的团队精神。同时,我谨代表课题组全体同人,向给予本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出版提供资助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01—2005年度专项课题资助)、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2005—2007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资助)和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历程研究创新基地(丛书出版资助)表示诚挚谢意,向世界知识出版社及鼎力支持并直接参与出版事务的相关人士深表谢忱。

由于学识有限,我们在研究和写作中力不能及乃至错误和疏漏之处必不在少,在此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杨栋梁

2009年10月18日

前 言

日本的历史与中国不能同日而语，但若从弥生时代算起，也历经两千余年，其间主要是漫长的封建社会，明治维新以后才进入近代社会，此后的历史也就是日本的近现代历史。

日本近现代政治史，也始自明治维新，但作为前史，应从幕藩体制的解体和幕末政治开始述及。幕末和明治维新至今已有 140 余年，其间日本从一个幕藩割据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民主制国家，虽历经多次反复与曲折，但总的趋势基本上可以说，日本近现代政治史也是一部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史。

一、日本近现代政治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

140 余年的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一）从幕藩体制到明治宪法体制

幕藩体制是德川幕府建立之后的基本统治方式，在整个江户时代，德川家的世袭将军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天皇作为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在江户时代仍是封建秩序的最高精神权威，历任将军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也都是由天皇授予的。

为防止幕藩体制的瓦解，德川幕府先后实行了三次幕政改革。即“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三次改革，除享保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外，宽政、天保两次改革均未成功。此外，幕府末期的多次农民起义也从根本上打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基础。

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幕府的基本政策是“锁国”，美国决定以武力迫使日本开国，佩里两次率“黑船”驶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面对威压，幕府被迫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通过《日美亲善条约》的签订，美国迫使日本走出了开国的第一步。随后，英、俄、荷等国援引美国先例，陆续胁迫幕府签订了类似的“亲善条约”，这意味

着延续 200 余年的幕府的锁国体制彻底崩溃。

在幕藩体制内部矛盾加剧以及西方列强施加外部压力的背景下，德川幕府采取了开国政策。在当时的各种政治思潮中，“尊王攘夷论”逐渐在幕末政治潮流中居于主流地位，成为推翻幕府政权的重要思想武器。

为了维护幕府统治和对抗尊王攘夷运动，幕府采取了“公武合体”政策，试图协调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积极推进朝廷与幕府之间的政治联姻，在西南强藩中，长州藩、萨摩藩相继借公武合体运动进入中央政界。

以萨长两藩为核心的倒幕势力，高举“大政奉还”的旗帜，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并最终通过戊辰战争消灭了幕府势力。戊辰战争的终结，标志着德川幕府的彻底灭亡和明治新政府的最后胜利。

明治时代的前半期，是日本由封建幕藩体制国家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过渡期。明治初期，在日本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巩固政权基础并建设近代国家。《五条誓文》表现出建设近代国家的积极精神。新政府公布《政体书》，实行太政官体制，此后，太政官体制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又历经数次调整。

“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在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彻底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分散割据状态，完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第二，它保障了改革措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加速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秩禄处分”与“土族授产”则是新政府进行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的改革。

为了摆脱落后地位，明治政府在改造封建国家旧体制的同时，积极推进国家的近代化建设，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

“征韩论”问题是明治政府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政府内部围绕着“征韩论”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的实质是反映了政府内部保守派与急进派在今后施政指导方针上的论争，即“内主外从”还是“外主内从”。该问题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存在。

《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在日本政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亚洲各国中，明治宪法是第一部宪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它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延续和发

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财阀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

明治宪法的最大特点是“天皇中心主义”，其最大弊端也在于“天皇中心主义”，尤其是“天皇统率陆海军”和“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的规定，使得军权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之外，军权对施政权的干预度，使它时时处在政权的“监护人”与“接管者”的地位，给国家政治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军国主义阴影，最终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体制本身所孕育的特殊权力，反过来成为体制的掘墓人。

（二）走向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体制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大力充实军备，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随后逐步确立了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

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权对中国所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资本主义由此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员参与瓜分世界，直至发动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表明日本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其他帝国主义相比，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军部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军事部门直属天皇；军队有“帷幄上奏”权，并可以操纵内阁，左右国政。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国民的头脑；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内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压制民众的觉醒，对外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朝着强化反动体制的方向越走越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这次大战中，日本垄断资本急剧膨胀起来，日本帝国一跃变成世界五强之一。伴随资产阶级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一批法西斯分子发起了一个“国家改造”运动。在日本陆军和海军内部，都出现了国家改造运动的核心人物和组织。右翼团体也与军部相互呼应，投入到国家改造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而且企图对亚洲、太平洋

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相继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就是贯彻实施这项侵略方案的必然结果，这表明天皇法西斯专政已基本形成。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内建立了战争体制，近卫内阁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决心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近卫新体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新体制运动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式的法西斯独裁体制的确立。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条内阁为加强法西斯的大政翼赞体制，把各个部门管辖的法西斯团体都划归大政翼赞会领导，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统一的法西斯自治系统。

（三）美国的占领与旧金山体制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政府公布的《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

麦克阿瑟决定采取通过日本政府进行统治的间接占领方式。实行间接统治而不实行军政，这就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体制。

美国占领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民主化政策，促使日本的旧统治体制迅速解体。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保障思想、宗教、言论、集会的自由；废除治安维持法等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法律、敕令及法规；释放政治犯；废除秘密警察及一切言论统制机构；罢免内务大臣、警视总监、特高警察等官吏。这标志着天皇制国家的治安机构解体，向民主化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随后，麦克阿瑟下达了“五大改革”指令，承认妇女参政权，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着手制定《工会法》，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国家与神道分离，冻结皇室财产，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等。还有解散财阀、解除公职、农地改革以及修改宪法等重大改革指令。

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的《关于解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和《关于废除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即“解除公职令”，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日本战后改革中占有重要一页，对日本战后政党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吉田内阁时代在日本战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日后日本的

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吉田时代完成的三件大事，一是战后日本经济复兴与自立；二是《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三是日本的重新武装初具规模。这三件大事，都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可以说，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维护日美关系是“吉田时代”推行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石。

《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在法律上取得独立，建立了“旧金山体制”。但这也是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对美从属的开始。

如果说战后初期的日本群众运动，是以经济斗争为主，那么，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改变与日本政府反民主路线的贯彻执行，尤其是媾和条约签订、旧金山体制建立以后，日本人民的群众运动明显地表现为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和平民主运动。反对美军基地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50年代初期的群众运动，是日本新宪法中和平、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对吉田内阁的反民主路线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四）“五五年体制”的确立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

鸠山内阁时期，在日本战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无论从经济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它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在经济上，日本经过十年恢复，从此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外交上，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和加入联合国，为日本走向国际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五五年体制”也始于鸠山内阁时期。

社会党是日本战后成立最早的政党。但由于其成分复杂，政见不一，1950年以后，左、右两派决裂，成立了右派社会党和左派社会党，这种分裂状态大约持续了四年之久。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民主路线和重新武装政策。为此，左、右两派社会党意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股逆流。经过四年分裂之后，社会党又最终实现了统一。

保守党的合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党特别是左派社会党日益强大，两派社会党统一的动向加强，甚至有可能出现社会党政权的前景令日本财界深感不安，他们从外部力促保守党合并。在保守党内部，很多人也在积极推进保守联合。社会党统一一个月后，自由、民主两党举行自由民主党成立大会，这样，一个统一的保守新党从此诞生。

政治上，由于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和自由、民主两大保守党合并为自民党，形成长达30多年的“五五年体制”。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的自民党长期政权，确立了自民党“一党优位制”。岸信介内阁之后，意味着“五五年体制”从政治上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完成。

岸信介内阁时期确立了所谓“岸体制”，对革新政党和人民群众运动采取强硬姿态。岸信介强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新安保条约增强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危险性，所以导致日本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安保斗争。

反安保斗争作为日本“战后”型反体制斗争，是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自民党在安保斗争中的最大经验教训，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义，而走经济优先的道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首相池田勇人。池田内阁采取“低姿态”政策，提出“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使政府以“中庸”面孔示人。池田的经济优先政策主要体现为对内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外实行进口贸易自由化政策。

连续执政七年八个月的佐藤政权，基本上继承了池田内阁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是自民党政权的黄金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时代的恩惠与机遇。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是自民党政权动荡的十年，其间，田中内阁因“金权政治”败露而下台。出现了有名的大平正芳和福田赳夫之间的“大福之争”。大平内阁时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四十天抗争”，大平正芳心力交瘁死于任上。大平之死，使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取得了出乎预料的胜利。

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势下，各在野党开始探讨成立联合政权的可能性。但围绕联合政权构想，在野党意见不一，各行其是，不但帮助自民党得以维持政权，而且也将原来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革新自治体”推向解体。

中曾根内阁的内外政策既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长的“大国意识”，顺应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潮流，其“1986年体制”论，是一种设想自民党作为优势政党连续执政的体制。

中曾根康弘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一贯主张修改宪法。中曾根内阁所推行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在国内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实行

行政、财政、教育三大改革，并大幅度调整防卫政策，增加防卫经费。在对外关系方面，追求其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拓宽亚太外交、协调南北关系。中曾根内阁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根本目就是要做政治大国。中曾根时期不仅确立了“政治大国”的发展目标、实现了政治转折，而且国内政局发展较为平稳、内阁支持率较高，是自民党一党优位制演变历程中的又一个“黄金期”。

1989年是日本政坛动荡之年。昭和天皇裕仁“驾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号为“平成”。宇野宗佑继任自民党总裁，在“绯闻事件”和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压力下引咎辞职，成为仅存在67天的“超短命”内阁。

海部内阁力主“政治改革”、打破“金权政治”体制，所以海部内阁支持率较高。但也正因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新政”形象而被迫下台。

宫泽内阁期间的主要政绩，是在公明、社民两党的支持下通过了PKO法案，从此揭开了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序幕。但宫泽内阁一直为金丸事件等“金权政治”丑闻所困扰，由此产生的政治改革压力不仅促使自民党局部分裂，而且导致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垮台。

（五）联合政权与“后自民党时代”

自民党下台后，日本七党一派共同组成了以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为首相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从此，日本政局进入了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联合政权时代。

细川内阁通过的“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一般认为是“保守维新”，它推动了日本保守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但有很大的局限性。

“先天不足”的羽田孜内阁执政不到两个月便匆匆辞职。村山联合内阁的成立，既是自战后初期片山内阁以来再次组成的以社会党为首的内阁，也是自民党下野十个月后重新执掌政权的开始。严重对立的自民、社会两党联手组建新政权，表明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淡化，权力争夺成为影响政界分化改组的主要因素。

在村山内阁期间，执政的社会党反而一直处于衰退之中，这是因为政党地位的变化迫使执政的社会党不得不大幅度调整该党先前的方针政策，而社会党基本路线的转变，对社会党自身势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最后社会党也正式更名为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

九个在野党派共同创建的“新进党”成为一支能与自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势力。新进党的成立，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党林立的局面暂告结束，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政界分化改组的进程。

以中央省厅重组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是桥本龙太郎内阁的主要业绩。日本国会通过的《中央省厅等重组基本法》，确立了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中央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精简行政机构、减员增效、强化内阁机能，突出首相的领导作用和主导地位，创立独立行政法人制度等。

新进党解体后成立的民主党以“民主、中道”作为政治理念，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崛起，反映了日本社会政治发展的倾向，即从中央集权型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形态的转变。

小泉内阁以“彻底改革派”姿态出现，对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等领域进行了“没有禁区的改革”，改革力度大，范围广泛。完成道路公团民营化改革之后，重点转向邮政民营化。小泉内阁所推行的“结构改革”历程，尽管一波三折，但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小泉内阁在对外关系方面，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大力推行亲美外交。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步伐进一步加快，政治右倾化倾向明显增强。小泉提出修改宪法、为自卫队正名、参拜靖国神社等具有浓厚“鹰派”色彩的政治主张，并将其视为“无禁区改革”的一部分。

小泉首相提出的“改变自民党”的口号和推行的“结构改革”路线，目的是重新巩固自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小泉效应”及其“另类性格”与以往历任首相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深受日本国民的欢迎和期待，内阁支持率较高，对自民党势力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为了适应社会多元化进程并维持执政党地位，未来自民党仍必须不断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

二、近现代日本政治的两面性

如上所述，纵观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历经一百多年，经过若干曲折和坎坷，日本终于从一个封建社会转化为具有现代文明的西方式法制社会和民主国家。要而言之，作为主线，近现代日本政治史，就是一部政